

2003 年 12 月
第 4 期(总第 51 期)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Adult Education of Gansu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stitute

Dec. 2003
No.4(General No.51)

死者名誉之法律保护再探

陈 莹

(厦门大学 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本文在剖析相关学说的基础上再次探讨了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问题, 论证了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实质上侵犯的是生者的一般人格权, 并对刚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下文简称《民法草案》)中有关死者名誉的规定作了简要的评析。

关键词: 死者名誉; 一般人格权; 人格尊严

中图分类号: D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759(2003)04-0096-03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理论界和司法界就对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无论是从伦理道德、社会公益还是侵害行为的可谴责性的角度出发, 死者的名誉都需要也应当进行法律保护,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但是, 究竟该如何看待侵犯死者名誉的行为? 如何给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定位? 在民法体系内该以何种名义对死者的名誉提供保护? 这一系列的问题至今在法律上仍未有定论。

一、对相关学说的剖析

对死者名誉保护的根据是什么? 死者是否享有对名誉的权利? 对此, 理论界和司法界形成了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 死者名誉权说。此观点认为死者和生者一样仍然享有名誉权并应受到法律保护。该学说的有力论据之一就是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司法实践部门在具体案件处理中的做法。而且, 著作权法关于著作人身权的规定突破了民法通则关于民事主体制度的基本原则, 允许死者在死后仍然享有权利, 因此死者享有名誉权并非法律所绝对禁止的。

第二, 死者准名誉权说。依此说, 死者的权利能力已经丧失, 不享有名誉权。但为保护其生前的利益, 使其生前的名誉免受损害, 可以适当参考法律关于胎儿利益的规定, 由法律规定死者在名誉方面如同生存, 享有一种与名誉权相类似的不完全的权利, 即准名誉权。此学说是建立在对民法主体人身权利延伸保护的理论之上的。

第三, 死者近亲属名誉权说。该学说主张, 死者与其近亲属有直接的人身关系, 死者名誉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其近亲属的名誉。因此, 对死者名誉的损害与其说是侵害了死者的“名誉权”, 倒不如说是侵害了其近亲属

的名誉权。死者的名誉受保护只是个表面现象, 实质上受保护的是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

第四, 死者名誉说。此种观点认为, 应区别名誉和名誉权的概念。保护死者的名誉不等于保护死者的名誉权, 死者由于不具有权利能力而丧失了名誉权。但是, 法律除了保护权利以外, 还保护合法的利益。死者的名誉虽然已不再体现为一种权利, 但体现为一种利益, 而且主要是社会利益。保护死者的名誉既是死者生前的愿望, 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所必须的。

上述四种学说虽然在各自的论域内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在理论上仍值得商榷。

首先, 死者名誉权说明显违背了我国民事主体制度的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 9 条规定: 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据此, 公民死亡后其权利能力终止, 不可能再继续享有民事权利。名誉权作为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人身权利必然随主体的消灭而丧失。著作权法有可以脱离权利主体而独立存在的权利, 就如同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鬼”, 在法学界中素有“鬼学”之称。著作权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它的规定并不能改变民法通则所确立的民事主体制度的基本原则, 也不能直接适用于著作人身关系以外的领域。而且, 最高人民法院对“死者名誉权”这一提法的使用仅限于早期的个案批复, 而在其颁布的抽象司法解释中只规定了侵害死者名誉的案件中诉权的归属和行使, 而未正面回答对死者名誉提供法律保护的依据。

其次, 死者准名誉权说也难以摆脱与民事主体制度的矛盾。既然承认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公民在其死后不能再享有名誉权, 那么公民同样无法享有类似于名誉权的准权利。至于人身权的延伸保护, 笔者认为它仅适用于对胎儿权利的保护, 不宜适用于对死者名誉的保护。因为胎儿虽然不是民事主体, 但成为民

收稿日期: 2003-05-13

作者简介: 陈莹(1980—), 女, 福建漳浦人, 厦门大学 2002 级诉讼法硕士研究生, 师从齐树洁教授研习民事诉讼法和民法。

事主体的机率非常高,对胎儿权利的延伸保护既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又能维护民事交易的稳定和安全。而死者已逝,不可能再介入民事法律关系之中,因此没有必要将人身权利的保护延伸至自然人死亡之后。

再次,死者近亲属名誉权说忽视了现代社会中民事主体的独立性。人类文明的演进清晰地告诉我们,个人是逐步摆脱家庭、家族的控制和影响而成为现代法律的独立主体。对死者的社会评价毕竟不等于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对死者名誉的侵犯并不必然导致对其近亲属名誉的侵害。即便是对死者名誉的侵害确实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死者的近亲属完全可以依照现行法律对民事主体名誉权的保护提起诉讼,而不必借死者之名进行间接的救济。

最后,死者名誉说也没能解释在民法体系中对死者名誉进行保护的依据。该学说虽然看到了名誉和名誉权的区别,但是它认为死者名誉所体现的利益是法律保护的对象,而且由于死者不可能再实际享有权利中的个人利益,所以对死者名誉进行法律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死者名誉中的社会利益。这只解释了为什么要对死者名誉进行法律保护,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在民法体系内对死者名誉进行保护。因为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即便是对社会秩序维护也是通过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的,单纯对死者名誉中的社会利益进行保护已经逾越了民法的调整领域。该学说也无法解释对单纯社会利益的法律保护的诉权却归属于死者的近亲属这一实践做法。

二、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实质上侵犯的是生者的一般人格权

若要在民法的框架内对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提供法律救济,就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侵害行为的受害主体是谁;二是受害主体的何种民事权利或是何种受民事法律保护的利益受到侵害。

(一)在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中,受害的主体只能是生者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让我们坚信“逝者已矣”,死者是无法感知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痛苦的。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具有可谴责性是因为它给死者近亲属造成负面影响或是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或是二者兼备。也就是说,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实质侵害的是死者近亲属的利益或是社会公共利益。无论是哪一种表现形式,受害的主体都只能是生者。换句话说,对死者名誉的保护完全是为了生者的利益。当侵害行为给死者近亲属造成负面影响时,受害主体当然就是死者的近亲属;当侵害行为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时,受害主体则是社会中不特定的多数人。

(二)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实质上侵犯的是生者的一般人格权

一般人格权,是相对于具体人格权而言的,是以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总括性权利。具体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并概括和决定其具体人格权的一般人格利益。一般人格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两方面。人身自由是公民享有一切自由权的基础和

根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的品质。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体现了黑格尔所说的使人们“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作为人”,人格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在民法领域的体现。

从1900年《德国民法典》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到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一次在立法上正式出现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再到当代社会多数国家的民法对一般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人格权制度经历了从具体人格权到一般人格权的渐次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程,这一发展历程也正是加强对人权的维护的历程。一般人格权具有解释、创造和补充的基本功能,它是一种发展性的权利,随着人类文化及社会经济的变迁,其内容也在逐步扩大。它克服了法律规定的局限性与社会关系的无限性的矛盾,在法律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适应社会需求对公民的人格利益提供保护。

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实质伤害的不是死者的利益,也不是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而是与死者有密切关系的生者的伦理感情(日本学者称之为追忆敬慕之情^①)。伦理感情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是人与人之间特有的一种情谊,它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师徒关系或其他密切交往所产生的。伦理感情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需的,它是人格尊严的体现,理所当然属于一般人格权的范畴。

在对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问题上,理论界和司法界都格外关注死者近亲属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把起诉权赋予了死者的近亲属,这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死者近亲属与死者之间更可能有深厚的伦理感情。从现实情况和便于操作的角度看,从保护死者近亲属的伦理感情出发来为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提供法律救济是妥当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侵害行为的受害对象并不必然局限于死者的近亲属。因为,伦理感情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基础上的,与死者有密切交往的并不局限于其近亲属,死者的徒弟、挚友,甚至当死者是公众人物时,其敬仰者对死者的伦理感情极有可能与其近亲属一样深厚,甚至比其近亲属更加深厚,这样的伦理感情同样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当然,赋予公民一般人格权并不意味着公民可以滥用这一权利。对死者近亲属以外的公民的伦理感情的保护应该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把起诉权赋予检察院,当其收到一定数量的公民申诉材料后,代表社会公众提起侵权之诉。按照这种框架,我们是通过对社会公众的伦理感情的保护进而维护社会公益和社会秩序,这就避免了死者利益说所无法克服的逾越民法调整领域的问题。

(三)在我国现行民法体系中如何对死者名誉进行保护

我国民法通则只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具体人格权,未确立一般人格权制度。笔者主张将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纳入民法通则第101条所规定的公民人格尊严的范畴加以救济。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人格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根据这一规定,有学者主张“公民的名誉权包括名誉和人格尊严两项内容”^②,杨立新教授也认为,

该条款中的人格尊严是名誉权的具体内容和组成部分^⑨。(当然,杨教授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人格尊严”的曲解)但笔者认为现阶段我们应该把人格尊严视为民法通则确认的一项独立的人格权,理由如下:第一,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存在明显的区别。名誉权是以对人格价值的客观的公正的社会评价为客体,侵害人格尊严的行为,未必造成对受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人格尊严并不是名誉权的构成要素之一。第二,从民法通则的制定背景看,当时的民法理论和立法技术都有很大的局限性,立法者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人格尊严”的法律内涵和意义。为了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为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提供更有效的保护,我们应该善意地解释法律,不能仅仅因为人格尊严与名誉权在同一条款中就否认了人格尊严作为一项独立人格权的存在。第三,将“人格尊严”理解为民法通则确立的一项独立人格权,可以暂时解决司法实践中关于死者名誉、肖像和公民隐私等问题的法律保护,避免了类推的“牵强附会”和法律空白的尴尬。

当然,把人格尊严解释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并把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视为侵害生者人格尊严的权利只是权宜之计,无奈中的无奈。因为,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具有广泛的含义,它是具体人格权立法的基础和依据,将其解释为一项具体人格权无疑又是对“人格尊严”的另一种曲解。

三、《民法草案》对死者名誉的保护

2002年12月23日《民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格权法在该草案中独立成编,被誉为民法典的立法创举。综观世界各国的民法典,法国的人格权法是依附于人法,德国的人格权法则是依附于侵权行为法,很少有国家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尽管学者对这样的立法体例还存有争议,但独立成编的做法的确体现了《民法草案》对人格权法律保护的关注和重视。

《民法草案》第四编人格权法中第1条规定:自然人、法人享有人格权。自然人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信用、隐私等权利。法人的人格权包括名称、名誉、荣誉、信用等权利。由此可见,该条款以描述性的语言形成了一个开放体系。第2条进一步规定:自然人、法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上述两个法律条文构成了该草案对一般人格权的承认和保护,扩大了对自然人和法人人格权益的法律保护范围,体现出权利时代的民法典的特色。依照《民法草案》所确立的一般人格权,我们可以将侵犯死者名誉的行为认定为是侵犯生者的人格尊严并加以救济。这样既恢复了“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核心内容的本来面目,又可以为侵犯死者名誉的民法救济理顺法理依据。

《民法草案》第四编第6条规定:自然人死亡的,其配偶、父母、子女有权保护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权利。该自然人没有配偶、子女或者父母已

经死亡的,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权保护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权利。该条文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并有所发展。首先,它将保护死者姓名、肖像、名誉等的实体权利,而不仅仅是将诉权赋予死者的近亲属。其次,它将死者的近亲属按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分为两个层次,并规定了行使权利的顺序。但是,从该法条的语词看,自然人死亡后仍享有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权利。而该草案第一编总则的第10条并未改变《民法通则》关于民事主体制度的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仍然是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因此,该草案第四编第6条的规定有悖于民事主体制度的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在《民法草案》确立一般人格权的基础上,为便于实践操作具体规定侵犯死者姓名、名誉等行为的救济方式是必要的,但决不能违背民事主体制度的基本原则;对死者近亲属实体权利的具体规定也不意味着死者近亲属以外的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仍然受法律的保护,他们同样可能对死者有着深厚情谊,他们的伦理感情也应该在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内。当然,对死者近亲属以外的自然人主张其伦理情感因侵害行为而受到伤害,法律应对此加以限制,避免该权利的滥用。

注 释:

董炳和:《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孙加锋:《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3期。

魏振瀛:《侵害名誉权的认定》,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1期。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修订本)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详见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2001年3月10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

张新宝、康长庆:《名誉权案件审理的情况、问题及对策》,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

王利明、杨立新、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⑨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杨立新:《被肢解的民事权利》,检察日报正义网“杨立新签约评论”,2001年5月6日。

⑩ 罗丽:《日本的抚慰金赔偿制度》,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1期。

⑪ 王冠:《论人格权》(上),载《政法论坛》1991年第3期。